

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 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

邓 野

摘 要：1943年1月中国与英美签署平等新约，中国至少在形式上废除了半殖民地地位。这个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具体经由国民党完成，对于蒋介石来讲也就具有相当的政治宣传意义，为此，蒋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蒋著的核心在于，将一个本来是中国与英美之间的民族平等问题，转换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政治选择问题。围绕“中国之命运”这道命题，中国产生了两个口号：其一，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其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两个口号的提出，意味着国共在继续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之间的阶级关系。

关键词：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 国民党 共产党

《中国之命运》一书是蒋介石的代表作。所谓“中国之命运”，就是以国家命运的名义，提出的一道关于政治选择的命题。具体而论，国家的政治取向，不同的政党持有不同的主张，因此，蒋著此一命题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一个选择什么党的问题。

蒋著是一部批判性质的著作。既然提出选择，必然包括批判与扬弃。蒋著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中共。通过一系列联系、比较与论证，剔除异类，将国家命运与国民党联系起来。

与蒋著齐名的是，陈伯达著《评 中国之命运》。陈文同样是一篇批判性质的论著。作为蒋著的对立面，同样，陈文也是通过一系列联系、比较与论证，但得出了与蒋著相反的结论，将国家命运与共产党联系起来。

蒋著与陈文所提出的基本论点，并未超出两党一般的政治学说，其本身并无多少理论创意。问题在于，这场彼此的政治批判发生在两党联合抗日的背景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发生验证了一个问题，即民族阵线的联合统一，并不能模糊彼此之间严格的党与党的界限。批判的程度愈是尖锐，愈是证明这种界限牢固的程度。

国共之间的这场相互的政治批判，是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表现最为强烈、最为集中的一次。因此，大陆出版的相关论著必予记载，但记载的方式，基本上就是当年延安批判方式的重复。

延安对蒋著的批判，以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等人的一批文章为主体，针对蒋著的民族、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论点展开批判。迄今，大陆相关历史著作的记载方式，基本上延续着当年的批判方式。

本文将提出并回答这样几个问题：蒋著成书的历史背景与命题的政治依据；蒋著批判与立论的方式。另一方面，作为蒋著的对象，中共又是如何认识并提出问题的，中共的反击及其方式。最后，蒋著对于国共关系的影响。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及其政治化

蒋著所以敢于提出“中国之命运”这道命题，其根据在于蒋拿到了一笔不菲的政治资本，此即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1942年1月1日，中国与英美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宣言，声明对轴心国联合作战，据此，中国与英美结为盟国。10天之后，蒋在日记中写道：“废除不平等条约交涉之时机，可开始矣！”这就是说，蒋一开始就把盟国关系的建立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视为一个互为联系的问题。7月4日，蒋再次自记：“在大战期中，必须要求美、英对我不平等条约，无条件的自动宣告废除。”的确，因战争而形成的新的国际关系，为无条件解决这一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蒋看准了这一点。

1942年10月9日，英美分别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治外法权是诸多不平等条约中的一项，以它的废除为起点，中国与英美分别展开缔结平等新约的谈判。所谓平等新约，亦即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随着这一进程的开始，中国各界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评论。

《大公报》社论这样写道：“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由七十一年前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中日间第一个条约）时开始，后经孙中山先生垂训定为国策。”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是否始自李鸿章，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不过，这个关于历史过程的叙述至少是非政治化的。

从当时的多种议论来看，人们对于旧约废止之后将产生的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兴趣更大些。例如，不平等条约中载有传教自由的条款，有人担心此条取消之后是否影响传教自由，并撰文争辩道：“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并不是逐条逐句均不平等，若传教自由问题在国际公法上俱认为平等的，决不因被列入不平等条约内而视为不平等。”从不平等中找出平等部分而主张保留，这倒是理性的表现。

此外，各种议论内容广泛，包括租界收回之后中国的市政管理如何跟上，外资撤走之后中国的纺织业如何发展，外轮退出之后中国的航运业如何顶替。而当时的热点话题则是，租界取消之后，中国人与外国人如何杂居。这些议题看上去颇为庞杂，然其性质基本相同，即就事论事，没有将问题用于其他的引申。

1943年1月11日，重庆政府分别与英美签署平等新约。就范围而论，尽管仅限于英美两国，实际上宣告了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围绕新旧条约的立废，重庆舆论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言论。

1月14日，《大公报》载文称：“这两个公道的条约，把‘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

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年，第9页。

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132页。

《百年耻辱一笔勾销》，《大公报》1942年10月11日，第2版。

《我对废除特权之准备》，《益世报》1942年11月6日，转引自林泉编：《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第995、996页。

九龙成为一个遗留问题。

权’、‘内河航行权’等各种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名词送进中国的博物馆。从兹以后，中国恢复了完整的国权。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污辱，付诸历史的长流去了”。人们对于平等新约意义的认识，首先是与半殖民地地位的废除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戴季陶、立法院长孙科等一批政要，也纷纷发表谈话祝贺新约。其中，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态度略为特别，孔是以一种喜忧参半的心态来看待此一事件的，他提出不少问题供人们讨论，实际上就是他所感到不安的一些问题。孔提出领事裁判权取消之后，“我国国民亦应自尊自重，以后避免与外国人发生冲突，而引起司法上的问题”。孔还提出租界取消之后，“我们应该如何使老百姓和外国人和爱相处，又如何使各城市乡镇的道路与卫生进步”等等问题。孔的结论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我们感到欢欣，也感到恐惧；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的订立，是我们幸福，也是我们难关。”孔将此举视为欢欣与恐惧并存，这种表述如果仅仅从文字上看，至少是一个两者互为抵消的结局。

一向具有理论兴趣的邹鲁，则以此为例，撰文阐述孙中山“世界须定于平”的思想。邹鲁这样写道：“这一个‘平’字，亦即孔门之所谓‘恕’。什么叫‘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使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的一切，能以‘平’为纲，以‘恕’为处事之本，那末世界和平，即可永久维持不坠。”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降，于是，将某个具有正义性质的国际问题，与某个中国圣贤的思想联系起来，证明这一思想的国际意义，这是中国部分人士追求心理平衡而时常采用的方式。

上述各种论点本身应当如何认识，是另一个问题。这些论点共同的特征是，将问题限制在其本来的范畴，即民族问题范畴。

然而，新旧条约的立废既然经由国民党完成，它就不可能只是一个纯粹的民族问题，因此官方的立场是竭力使之政治化。1月14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不平等条约存在了一百年，“中国国民党在此一百年中奋斗了五十年，最后产生本党总裁……如果没有本党，没有总理与总裁，世界尽管如何变化，不平等条约必依然存在。”“为什么过去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而今日则能，因为今天有蒋委员长，今天有蒋委员长领导下之国民党。”尔后该报又载文称：“天不赐给我们先知先觉的国父与英明伟大的总裁，谁来领导我们奋斗？没有精深博大的三民主义，还有什么配来唤起民众共同奋斗？”这是对问题的政治归结，归结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国父、总裁。

作为这种政治归结当然的诠释者，国民党的一批理论家纷纷撰文阐述此一事件的理论意义。

陶希圣认为，通过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我们得到一个总结论，就是只有国民革命是正确的路线，其余的各种主张，各种学说不过路面上的一些草芥、一点石块。”“把握历史的宿命者，其意志即为造成历史的动力。只有把握历史的宿命者，可以依他的意志造历史。别的人都不能如其意志以造历史。百年来，国父是这个人，如今总裁继国父之后亦是这个人，如其意志以造历史的人。”

《充实平等的内容》，《大公报》1943年1月14日，第2版。

孔祥熙：《平等新约订立后国民应有的责任》，林泉编：《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第1068、1069页。

邹鲁：《从废除不平等条约说到世界永久和平》，《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1943年3月，第3页。

《这是谁的成功》，《中央日报》1943年1月14日，第2版。

《五十年来奋斗的成果》，《中央日报》1943年1月16日，第2版。

陶希圣：《百年来两个潮流一条血路》，《中央日报》1943年1月17日，第2版。

叶青则这样论述问题：“废除不平等条约底成功是三民主义底成功，国民党底成功，蒋总裁底成功，这可以看作正确的定论。如此，我们就可说三民主义、国民党、蒋总裁能够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因而能够满足中国需要了。中国有三民主义、国民党、蒋总裁以后，便用不着别的主义、别的政党、别的领袖了。因此可以说中国只需要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总裁。这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底成功所给与我们的教训。”

根据新旧条约的立废，陶希圣的结论是国父与总裁可以“如其意志以造历史”，而叶青则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能够满足中国需要了”。陶、叶的论点表明国民党在力求将问题政治化。

在战争条件下，新旧条约的立废其实际意义有限，其中，租界以及内河航运权的废除，实际意义几乎等于零。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毕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由于此举具有天然的正义性质，因而也具有相当的政治宣传意义。蒋所以力促解决这一问题，其着眼点就在这里。

从官方的宣传来看，简单且傲慢，证明了国民党智库思想的贫困。接下来，蒋又如何将此一成果变为国民党的一笔政治投资？总之，新旧条约的立废，为蒋写作《中国之命运》提供了基本的政治素材。

中共最初的态度

新旧条约的立废对于中共而言，同样是一个民族与政治互为交叉的问题。就民族立场而论，中共不能回避，必须正面表态支持。但就政治立场而论，则是一个极具分寸的问题：既不能否认、又不能突出国民党，既要承认国民党的地位，又不能被对方矮化。如何把握其中的平衡，取决于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

1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首先肯定新约的签署，“从此中国和英美，已站在真正平等的地位”。“签订了这两个新约，才把我国百年来在国际上不平等的地位废除！”这个关于民族问题的表态与当时的社会舆论是一致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政治表态，社论这样表述：“新约的成立，是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的英明外交政策的成就，更是我国人民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的结果。”

政治是现实的。考虑到《新华日报》所处环境及其统战性质，社论完全撇开蒋是不合适的。社论采取的方式是，将罗斯福、丘吉尔摆在蒋的前面，一并提出，一并赞扬。这种排列顺序与赞扬方式，既未撇开蒋，又未突出蒋，既赞扬了蒋，又未将这笔账全部记在蒋的名下。这种政治分寸是两党政治关系的反映，既要合作，又要独立，避免在政治上被纳入对方的轨道。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谈判基本中断。此时，林彪代表中共赴渝谈判，中共一度估计双边关系有好转的可能，在此背景下，延安对这个问题采取了正面与平衡相结合的宣传方针。

1月29日，延安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决定在肯定平等新约的同时还有这样一些文字：“百年来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斗争涌出了领导这个斗争的国

叶青：《论废除不平等条约底成功》，《中央日报》1943年1月21日，第3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有关《中国之命运》的论述，完全回避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与蒋著之间的关系（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803、804页）。其实，这一点恰恰是蒋著主要的成书背景，回避这一点，蒋著的由来及其立论依据等问题是不能说清楚的。

《中英美关系的新纪元》，《新华日报》1943年1月12日，第2版。

民党与共产党”；“上一次国共合作，曾经收复了汉口、九江租界，这一次国共合作，又取消了不平等条约”。

中共的该项决定有两个要点。其一，明确将国民党称作独立解放斗争的领导党之一。这个论点涉及对国民党的政党性质的定位。此一表述方式显然与当时国共谈判的背景有关，力图营造一种良好的政治氛围。其二，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归结为国共合作的结果。这个论点显然是为了排除国民党独占此项成果，强调中共在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2月3日，朱德对《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称：“最近中美中英签订的新约，我认为这是中国在国际间获得独立平等的开始。”“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这次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又获得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就，扫除了我国在国际地位上的不平等”。再次强调新约的成立是国共合作的结果，此即民族与政治的平衡。

2月4日，延安举行大规模群众庆祝集会，两万余人参加。会场悬挂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六人画像。在其后发表的大会通电中有这样一些话：“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乃明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政纲，厥后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于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呼声遂传播于全国。”

这个通电的要点在于，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历史过程的叙述，明确地将中共摆在孙中山之前。而会场上六人画像并列，也是力争中共地位的表现。

朱德肯定地表示，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中国在国际间获得独立平等的开始”。那么，获得独立平等之后，中国旧有的半殖民地社会性质改变与否，这一点中共方面基本不予涉及。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决定中共的革命性质（反帝反封建）。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因此，与当时的社会舆论形成明显的区别，中共对于半殖民地问题没有明确表态。

综上所述，中共在新旧条约立废问题上的表态，着重强调国共合作，力争中共在其中的地位，力求避免被国民党在政治上边缘化。

蒋著主题与对象的确定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为蒋写作《中国之命运》提供了政治基础。蒋著的主题是，围绕不平等条约产生与废除的历史过程展开叙述，集中提出并回答一个问题：哪个党能够救中国。而蒋著所面向的主要读者群，则是广大的中国青年。那么，蒋著的这一主题与对象又是怎样确定的呢？就其直接原因而论，同蒋与林彪的一次谈话或多或少有些关系。这是一个从未有人提出过的问题。

1942年10月，奉延安之命，林彪作为中共代表赴渝谈判。10月13日，蒋在官邸约见林，从谈话记录看，主要是林说蒋听。林彪谈话以坚持国共合作为主题，既然谈合作，必然强调合

《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1月29日，第1版。

《朱总司令发表谈话》，《解放日报》1943年2月4日，第1版。

《大会通电》，《解放日报》1943年2月5日，第1版。

数月之后，在中共对蒋著展开批判的背景下，范文澜撰文指出：“现在的中国，在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在非沦陷区，除几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外，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范文澜：《谁革命？革谁的命？》，《解放日报》1943年8月1日，第1版）此时提出这个问题，与当时的国共论战有一定的关系。

作的基础，为此，林之谈话尽可能地淡化两党意识形态的对立，找出两党的共同点。

林彪主要就两个问题做了解释。关于两党的政治学说，林这样解释：“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实具有共同之理想，所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即此两主义根本一致之观点。”关于两党政治上的同共点，林这样说：“我党共产主义之目的，在救中国，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理论上毫无二致。”“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

关于两党在救国问题上的一致性，是林彪重点强调的问题。林具体举例说道：中共“现在老辈同志亦如国民党之诸先进大抵为辛亥革命之参加者，而后一辈之青年同志，当初亦皆首先加入国民党，后来始转入共产党。我个人即属如此，当时乃完全激于救国之热忱，本于救国之一念，故投身黄埔，加入国民党，至今在我脑海中所留最深刻的印象，厥为校长当日之训诲。但以后因认识共产党为救国的，始加入共产党”。这段话的意思是，由于两党在救国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两党在历史上曾同为一体。

林之话题既然由国民党说到共产党，接下来，他对共产党这样解释：“可以说凡属中共党员，皆未读过很多之共产主义书籍，只以目击当时帝国主义所施于中国之侵略压迫，如划设租界，实行领事裁判权，夺取我内河航行权等种种不当中国人为人、不当中国为国家之事实，大家激于义愤，心切雪耻救国，故相率入党。即现在许多青年学生之要求加入共产党，其根本动机，亦复如是。”林彪的结论是：“即令将来中共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亦必须经过救国的阶段。则至少此一阶段中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无异于中国国民党之一部分。”

林彪关于共产党即救国党等论述，其本意是淡化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说明两党是有合作基础的。其中，关于广大青年并非因共产主义学说而是出于救国热忱而加入共产党的论述，关于他本人因认识共产党为救国的，故由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论述，其本意也是说明这种选择并不包括意识形态。问题在于，林彪的这一表述方式等于向蒋提出一个问题：在救国问题上，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因此，在广大青年当中，国民党的吸引力不如共产党。

当林彪向蒋提出此一问题之际，恰逢英美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且平等新约的谈判即将开始。这就是说，林彪关于租界、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运权等等不把中国人当人、不把中国当国家的问题，已经或即将由国民党解决。这个正在启动的政治进程将为蒋提供一笔足够的政治资本，使他能够底气十足地回答林彪所提问题，并且借此举起反帝救国的旗帜，从而将广大青年吸引到国民党周围。

陈布雷是蒋著执笔者之一。由于蒋著涉及大量中英问题，为此，陈于蒋著出版之前，特地征求因参加中英新约谈判而滞留重庆的驻英大使顾维钧的意见。顾维钧记载：“陈布雷向我解释了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他说，委员长注意到近年来中国的青年人参加共产党的问题。他感觉，他们之所以被共产主义学说所吸引，只不过是因他们误解了作为国民党基本政策的所谓三民主义的含义。中国青年似乎认为，三民主义不足以有效地反对和战胜帝国主义。因此，他们当中很多人跑去参加了共产党。”

接下来，陈布雷就上述背景具体举例做进一步介绍，“他引证了曾经是委员长得意门生林彪的情况。林彪曾对委员长说，他参加共产党是因为他对国民党极为失望。他极愿为中国的富强而效力；为达此目的，就必须打倒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他觉得国民党的政治哲学，由于其固有

以上所引林彪谈话，见《蒋委员长召见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谈话纪录》，1942年10月1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5年，第238—240页。

的妥协精神，是不适当而且不起作用的。”前引林彪谈话记录显然经过整理，陈布雷所言可视作林彪谈话的补充。

可以肯定，蒋著的写作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不过，陈布雷以林与蒋的谈话为例，以此作为蒋著的写作背景来介绍，表明林彪谈话至少是促动蒋执笔的因素之一。从蒋著的核心内容来看，正是在回答林彪所提问题：哪个党才能救中国。而蒋著力求解决的问题同样出自林彪所提，此即与中共展开政治争夺，将广大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一边。

蒋著批判与立论的方式

蒋著以“中国之命运”为题，此一冠名颇为醒目。蒋著关于民族、历史、哲学、宗教、文化等等论点，当年，延安的理论家以论战的方式与之展开过辩论。本文侧重研究蒋著批判与立论的方式。

“中国之命运”这道命题实际上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哪个党才能救中国；其二，中国的政治归宿。这是互为关系的两个问题，前者是依据，后者是结论。蒋著是以这样的方式将两者联系起来的：以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与废除作为全书的基本线索，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阐述，论证哪个党才能救中国。这个问题明确之后，再将国家的命运与哪个党捆绑起来，也就是没有哪个党就没有中国。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前途与归宿应当纳入哪个党的政治轨道。

蒋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提出这一命题，这一点本身就是对问题的回答：国民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在于，蒋著并不是在孤立地论证这个问题。蒋著如果没有设置一个或几个政治对立面，那么，“中国之命运”的提出就是多余。因此，蒋著必然是一部批判性质的论著，通过一系列联系、比较、批判与扬弃，由此而论证其所提问题。

从现象上看，蒋著批判的范围甚为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心理、哲学等等，但主要的政治对象集中为两者：其一，帝国主义与英国；其二，共产主义与中共。这又是一个互为关系的问题。只有高举反帝大旗，才能削弱中共的政治基础。批判前者实际上是对历史问题的了结，批判后者才是蒋著真正的着眼点。

那么，蒋著所以能够站在批判者的地位谈古论今，其根据何在？此即国民党在救国事业上交出的成绩。在这里，蒋的手中有两张牌：其一，辛亥革命；其二，废除不平等条约。前者推翻了中国的封建王朝，后者废除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可以说，正因为有这两大救国之举，蒋才敢于提出“中国之命运”这道命题，放胆向对手叫板。就立论根据而言，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一个发生在眼前的事例，更具说服力，因此蒋著主要以此为依据展开论述，最大限度地利用此一政治成果。

蒋著以批判不平等条约作为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蒋著所采取的方式是，将不平等条约问题描述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精神与物质的存在，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法律、心理等等无所不包。在此基础上，将一切批判的对象置于这个框架之内，然后，再以批判不平等条约的名义对其展开批判。

将以上几个问题弄清楚之后，蒋著也就不难解读。

本段及上段引文，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08页。陈布雷所以向顾介绍蒋著的写作背景，意思是蒋著并非针对英国而作，因此英方不必介意。另外，陶希圣亦为蒋著执笔者之一。

蒋著直接涉及中共的内容并不算多，其论点本身基本上也是些老生常谈，如果说有什么可供“鉴赏”之处，也就是它的批判方式。

蒋著是在批判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社会心理影响这一条目之内，提出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批判的。蒋这样提出问题：近百年来，“就是因为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于是中国人本为不甘心做奴隶而学西洋的文化，然而结果却因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了。”

这是关于问题的提出，接下来转入批判。蒋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所以他们领导的各种学说和运动，只能暂而不能久”。

变与常，暂与久，这两对概念在哲学上应当如何解释，那是另一个问题。本文的兴趣在于蒋对问题的联系。蒋是把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置于不平等条约的范畴之内，作为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危害，以批判不平等条约的名义而提出对两者的批判的。

蒋著对中共的政治批判，主要是指责中共为“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蒋著是以租界、外国驻兵权与封建割据作为话题而引出这一批判的。蒋这样写道：“现在，不平等条约既已撤废，租界与外国驻兵区域不复存在，封建割据亦早归没落了。”这是关于问题的提出。接下来再将问题与中共联系起来，蒋说：“你看列强苏联和英美各国尚且都希望我们民族解放进步，国家独立自由，所以他们在百年以来所有无限的权利，和无上的势力——就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条约，到了今天都已自动地先后放弃了。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

租界与割据都是妨碍国家统一的，在这里，蒋是以统一作为话题，将租界与割据联系起来，将列强与中共联系起来，一并提出指控。这段文字是蒋著出版之前增补上去的。1943年1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增补文稿，指斥共党为变相军阀与新式封建一段时，诚精思入神。此文如非自撰，恐任何人不能深入此境也。”变换一种指控方式，看来，蒋自己甚为满意。

蒋著的全部核心归结为这样一段结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一句话，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

本段及上段引文，见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3月普及本第110版，第71、72、73页。蒋著以上论点遭到陈伯达的尖锐批判，陈指出：“蒋先生在此公开反对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苏俄的共产主义思想……蒋先生此书一出，难道不怕希特勒、莫索里尼、东条、汪精卫辈引为同调，而使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觉得可惜，觉得齿冷，觉得丧气吗？”（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第3版）把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变为反对美英苏，反过来，把蒋置于被批判的地位。

《中国之命运》，第185页。

《中国之命运》，第199页。

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268页。

《中国之命运》，第195、196页。

综上所述，蒋著所采取的基本批判方式是，将问题套入不平等条约框架之内，从中完成问题的提出、展开与批判。在这里，蒋把全部问题变成了这样一个公式：不平等条约肯定是不合理的，那么，其他与之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当然也就是不合理的；反过来，批判不平等条约肯定是合理的，那么，对于一切与之相联系的事物展开同样的批判，同样，也就是合理的。蒋著此一批判方式的核心就是混淆概念。

其实，蒋著基本的立论方式，同样建立在混淆概念的基础之上。这一点集中表现为蒋著对于“正义”这一概念超范围、超限度的运用。

如前所述，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有限，有些条款的实际意义几乎等于零。然而这个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政治成果，却具有极佳的观赏效果，因为，此举具有一种天然的、绝对的正义性质。

问题在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所具有的正义性质，本来仅限于中国与英美之间的民族平等，仅限于国与国的范畴，因此，其正义性质仅具局部意义。蒋之文章就做在这里：将一个本来是局部意义的正义性质，引申扩展至整个国民党，据此将国民党整体包装为天然的正义与真理的化身，将正义变为国民党的专利。接下来，再将问题引向异党，以正义的名义向异党提出一系列政治指控。如此这般引申与转换之后，中共这个国民党的对立面，在蒋之笔下也就成为正义与真理的对立面，成为另类。

蒋著所采取的批判与立论的方式，从逻辑上讲经不起分析，但就宣传而论，则有其一定的实用性。

总括而论，蒋著的出版，把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变为国民党的一笔政治资本，一个本来只是国与国之间的民族平等问题，最后演变为党与党之间的政治选择问题。

国民党高层的争议

陈伯达《评 中国之命运》一文，开篇即对陶希圣撰文宣传蒋著表示诧异：“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由于陶曾有过一段汉奸经历，点陶之名，是为增强论战的效果。其实，头一个传布蒋著的并非陶希圣而是张治中。

2月8日蒋著出版之前，张治中以三青团书记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他说：“在全国庆祝平等新约的欢声中，领袖蒋先生将以他的巨著《中国之命运》刊布，这是主宰现代中国命运的巨人的启示。”尔后，蒋著出版之初，张又撰文称：蒋著“不仅是我中国建国所应遵奉的南针，亦同为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宝筏”。张文还介绍了蒋著的一个重要论点：“如所谓资本主义，所谓共产主义，都是抄袭的外国药方，不足以救中国。”继张之后，陶希圣撰文称：蒋著“把中国五千年立国之道，百年来衰落之由，和五十年来国民革命的奋斗，五年半抗战的牺牲，无不指出其详明确切的意义”。

尽管张、陶对蒋著定位甚高，但事实是，蒋著甫一出版即在国民党高层引起不小的争议，

陈伯达：《评 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第1版。

《张治中对青年播讲 中国命运与中国青年》，《新华日报》1943年2月9日，第3版。

张治中：《读 中国之命运》，《中央周刊》第5卷第32期，1943年3月25日，第1页。“宝筏”为佛教用词，意为引导人们到达彼岸的佛法。

陶希圣：《读 中国之命运》，《中央周刊》第5卷第33期，1943年4月1日，第1页。陈伯达所指就是这篇文章。

最为集中的一点即蒋著对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的抨击。蒋著既然以批判不平等条约作为基本线索，必然大量涉及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在侵华历史上的斑斑劣迹。然而，时过境迁，历史上的外敌，如今又成为相当重要的战时盟友。历史与现实两者应当如何把握，此即争议的焦点。

蒋著于1943年3月中旬出版，王世杰日记3月24日记载：“张岳军自成都来电话，对于书中指摘英美俄过去对华政策部分，深以其有伤友邦感情为虑。”看来，党内的异议反映相当迅速。然而，一个更大的麻烦接踵而来。蒋著出版后，蒋立即指示译成英文向国外发行，此举更加引起不安。3月30日，王世杰日记记载：“今晚蒋先生问及‘中国之命运’英译事。予深以此书对友邦人士多所刺激为虑，力言如译成英文须摘由意译，删略一切刺激外人之语，盖是书在供国内青年阅读，主旨原不在对外也。”

蒋著的英译，等于是将对英美的指责主动示于对方，王世杰颇感不安，为此，王出面约请几位重量级人士交换意见。王世杰日记4月9日载：“昨晚在中央党部秘书处，约王亮畴、何敬之、吴铁城、朱骝先诸人与余共商蒋先生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如何译成外文。到会诸人群感忧虑。亮畴素日甚缄默，当时亦多忧虑之语。”王宠惠字亮畴，被蒋指定担任英译，因而王颇感棘手。

或许因为蒋著在高层人士当中并未引起预期的反应，为此，蒋采取了一项硬性措施。4月5日，铨叙部次长王子壮记载：“总裁命令次长以上一律限十日内作读《中国之命运》一书之报告。”以命令的方式要求次长以上官员提交读书报告，其实质就是要求人人表态。

读书令下达后，军政官员开始奉命读书。军事委员会采取集体研读的方式。据军令部长徐永昌4月8日日记：“下午在军委会集会，研讨中国之命运一书（蒋先生意）。除为章外，咸谓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一章）不惟过于刺激其他各友国，亦极难堪英国，在今日而言此殊嫌不智。”刘斐字为章，时任军令部次长。蒋著对于帝国主义的抨击集中在第三章，徐永昌的记载表明，刘斐之外，与会者均认为第三章“殊嫌不智”。

此外，徐永昌对蒋著其他内容亦持异议。蒋著第一章主要讲民族问题，第二章主要讲辛亥革命，徐对该两章的论点均不甚赞同。徐称：“余对于第一章（中华民族的长成与发达）以为对中国历史尚有未了了然，而忽略汉满蒙回藏大皆炎黄子孙。对第二章（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以为总理恶清廷政治，欲颠覆之，所云驱除鞑虏满族等等，不过是一种临时适用的方法，在今日谋建国对外之时，而仍据对内革命用语则不免大误。”

徐平日对于民族问题略有研究，因此他对蒋著意见最多的即民族问题。徐认为：“蒋先生忽略了汉以前无所谓汉族，亦忽略了华夷本属一家的的事实，及华夷所以分的原委。”徐的中心意思是，民族问题甚为复杂，蒋著不应轻率做结论。另外，蒋著在论述辛亥革命时，仍然照引孙中山的一些排满言论，徐认为这些话在时下是不合适的。

民族与排满只是几个具体问题，总体而言，徐对蒋著这样看：“关于对外国、对清廷仍系善于责人，不知责己。蒋先生似以为从此可以自强，对列国无所依赖矣。”善于责人，不知责己，

《王世杰日记》，1943年3月2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王世杰时任参政会秘书长。张群字岳军，时任四川省主席，随省府长住成都。

《王世杰日记》，1943年3月30日。

《王世杰日记》，1943年4月9日。王宠惠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何应钦字敬之，时任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吴铁城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字骝先，时任组织部长。

《王子壮日记》，1943年4月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本段及以上三段引文，见《徐永昌日记》，1943年4月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正是蒋的个性的表现。

4月9日，军委会的集体学习继续进行。军法总监何成浚记载：研讨过程中，“结果发表意见者颇多，大半以此书为我国最高领袖所撰述，对外关系不能不审慎顾虑，免外人有所批评，丧失尊严”。

军委会连续两日的研读，意见集中在对外关系，也就是应否指责英美俄。这个问题本身应当如何把握，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但这些意见至少说明，国民党高层人士并未把蒋著视为“主宰现代中国命运的巨人的启示”。

蒋是以征求意见的名义下令读书的，人们对此的理解是，蒋将根据意见而做修改，于是便出现了上面那种“发表意见者颇多”的场面。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颇为使人扫兴。4月18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发出代电，要求全国各级机关、各级党部、各大中学校、各战区官兵研读蒋著。该电表明，蒋对是书并无修改之意。当日，颇为失望的徐永昌自记：“按蒋先生前已令各院部会副主官以上研讨批评并将意见限四月某日分别汇陈。余以为此实准备修正之此意。观上之代电，似无意于修正，只恐人不读耳（该书一、二两章及其以后各章之类同者遗患甚远，第三章及其以后类似者则报在眼前。但吾人不自译书仍可作为对内之作，今已令王亮畴译书，是并对外矣，奈何）”。

至此，人们这才明白过来，蒋之读书令并非为修改，而是“只恐人不读耳”。蒋著一、二两章即民族与排满问题，徐认为蒋之论点“遗患甚远”。第三章即对帝国主义的谴责，徐认为其结果将是“报在眼前”，意即将遭英美报应。

那么，蒋对于军委会集体学习所征集到的意见又是如何答复的呢？徐永昌记载：“委员长于军委会所研讨中国命运一书之结论，除对余所拟中华民族长成等意见交王秘书长参考修正外，其余悉不采纳。”所谓其余悉不采纳，当然主要指人们所集中反映的关于如何对待英美俄的意见。看来蒋是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这一写法，对于此类意见不屑一顾。

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记载：“《中国之命运》一书，外间批评颇多。最多数的人，认为不平等条约业已取消，何必再责备和得罪英国人。有一次军事会报，何总长、白副总长提到此事，委座云，我正为此而写，你们军人，不应怕得罪外国人。”

10月7日，蒋曾在日记中做过这样一个自我鉴定：“中国之命运出版以来，最反响者，一为英国，二为中共，此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凡事利害不能完全避免，自信此书对于国家与民族之影响，将愈久而愈大，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这段日记表明，蒋对其中的利害是做过权衡的，蒋所以采取这一写法并非疏失。

如前所述，徐永昌曾经推测，蒋著所以敢于谴责西方列强，“蒋先生似以为从此可以自强，对列国无所依赖矣”，并判断蒋之所为将遭报应，且“报在眼前”。隔年，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名为“一号作战”的战略进攻，国民党军一再溃败。当河南战役处于危急状态之际，徐永昌记

《何成浚将军战时日记》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44、245页。何在当天日记中还记载了军委会的研读方式：“昨今两次研讨，均由何总长主席，命秘书一人持原书朗读，每读毕一段，即询问在座诸人有无意见，有者可尽量陈述。”

《徐永昌日记》，1943年4月18日。

《徐永昌日记》，1943年4月22日。王秘书长当指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355页。

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409页。

载：“最近英美人士对我仍不免于讥评，且多引中国之命运一书作反证。”9月，随着湖南战役的失败，战局更加不利。徐又记载：“据报，伦敦若干家大报馆皆将中国运命一书译出登载，评语极坏，有的竟谓系希特勒自传。”幸灾乐祸，作壁上观，这大概就是蒋著在英美舆论界引出的报应。

政治是现实的。历史问题如何处理，说到底，还是一个与现实如何平衡的问题。就蒋著而论，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历史问题具有两种现实选择：其一，不提或少提历史问题，以顾全与盟国的关系；其二，通过批判帝国主义列强，高举反帝救国大旗，从而与中共展开对广大青年的政治争夺。蒋选择了后者。

王世杰曾就蒋著英译本问题劝告蒋：“删略一切刺激外人之语，盖是书在供国内青年阅读，主旨原不在对外也。”蒋著之主旨在对内而非对外，这一点人们大都能够读懂。问题在于，对内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蒋著之对内（救国），必须通过对外（反帝）才能成立。在这里，外是内的依据，如果没有其外，也就没有其内了。看来，蒋著的这点意思，国民党高层相当部分人士始终没有读懂。

中共对蒋著的反击

蒋著出版后最初三个月，中共方面没有做出强烈反应。4月22日，毛泽东在一复函中说：“《中国之命运》我已要陈伯达写一意见（数千字，征引原文），送政治局各人看，看后再考虑办法。”把蒋著提交政治局，表明引起了毛的高度警觉，而“考虑办法”则表明毛尚未做出决定。

当年5月，蒋经过多方观察，判断日军即将进攻苏联。日军一旦北上攻苏，其在中国战场的军事行动必然采取收缩方针，这样，蒋便可以腾出力量解决中共问题。不久，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在蒋看来，中共的内外环境即将发生诸多于其不利的转换，基于这一判断，蒋制定了数个肃清陕北的计划，国共关系骤然紧张起来，中共称之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此背景下，作为对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政治反击，中共随即把对蒋著的批判提上议程。

7月13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抓住蒋介石的流氓政治。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要痛驳。中共方面所撰写的代表性的反驳文章，即陈伯达著《评中国之命运》。7月19日，毛泽东就陈文发表的具体安排指示秦邦宪、陆定一：“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两次。另印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15000份。”就陈文的刊登版面、广播时间、印刷册数做出如此具体的指示，表明毛对陈文的重视与欣赏。7月21日，陈文在《解放日报》发表，当日，毛致电各中央局，要求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

从中共的视角看问题，蒋著的核心被锁定在第七章，陈文的批判重点也在这里。陈文指出：“‘中国之命运’的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这是全书的核心。其

《徐永昌日记》，1944年5月1日。

《徐永昌日记》，1944年9月28日。“中国运命”系笔误。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34页。
关于蒋进攻延安的策划与取消，笔者将另文论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27、428页。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58页。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58、459页。

中心思想，在实质上说来，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其中心思想，就是国民党即中国，中国即国民党。”

蒋著第七章针对中共的武装割据而作，主要内容是讲统一。其中关于统一问题的解决设定了一个时间：“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之中。”意思是不会将这个问题留到战后。对此，陈伯达抨击道：“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着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二年决定命运’，原来在书中已写得明明白白了。”

中共的此一反应被蒋记录下来。8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中共对余‘中国之命运’第七章，最近乃露骨攻讦，盖彼以为余决心在此二年之内，必欲解决其事也。此为本书重要之点即试验其对军事、政治有否抛弃割据之局势，而可以政治方法和和平解决之意，今其态度已毕露，对于政治方法之解决，完全绝望，乃不得不准备军事，此乃本书所发生之又一效用也。”

蒋著关于“二年之中”这个时间设定，延安的解读是两年之内消灭中共，而从蒋的日记看，他是特意写上这句话以此“试验”中共的反应。总之，通过不同的解读，国共得出了各自的结论。

蒋著所宣扬的核心是，将国家与国民党捆在一起，这个论点当然不能得到中共的认同。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发表讲话，他说：“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毛之所言是从历史的角度说明蒋的这个论点不能成立。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意即国民党不能与国家捆在一起。

蒋著关于哪个党才能救中国的论证方式，是以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作为依据，在这个范围之内，完成问题的提出、展开与回答。这个自设范围、自定依据、自做结论的方式，本身就是对话语权的垄断。如前所述，中共一开始便强调，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国共合作的结果。这个说法从政治概念上讲有一定的道理，但就新旧条约立废过程的具体交涉来讲，则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就论战效果而言，中共如果同样以此作为立论依据，是难以战胜对手的，也是不高明的。

中共所采取的方式是，基本上撇开不平等条约问题，完全跳出蒋著所设定的范围，另外构建一个全新的立论依据，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来回答蒋著所提问题：哪个党才能救中国。范畴与依据变换之后，原本为蒋著所独享的参照标准，也就没有了可比性。

中共用以立论的依据，即国共抗战成绩比较。抗战不仅同样是一个关于救国的话题，而且较之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更具实际意义。把问题的提出与回答放在抗战上，既是坚实的，又是更加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

8月24日，《解放日报》头版全文刊载新华社编辑的两份材料，其一，《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其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的概况》。新华社在按语中写有这样一段话：“蒋介石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曾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今观此二项材料，究竟真如蒋先生所说呢？还是相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是关于问题的提出。

接下来，两份材料中列举了这样一些数字比较：“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三十六个师

陈伯达：《评 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第4版。

《中国之命运》，第191页。

《评 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第4版。

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第363、364页。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页。“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蒋著全篇贯穿此一思想，并且也有几句内容与之甚为相近的词句，但此一原话笔者尚未见到。

团六十万人的百分之五十八（三十五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百分之四十二（二十五万人）。共产党又抗击了全部伪军六十二万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五十六万人），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百分之十。”这是关于问题的依据。

两党成绩比较之后，新华社在结束语中肯定地表示：“由此可知，蒋介石先生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很明显的，不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是关于问题的结论。

新华社按语与结束语的发表，头一次针对蒋著提出了中共自己的口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并且头一次以对立的方式，将国共的两个口号摆在一起。

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实际上就是以社论的方式，为新华社的两份材料做结论。社论再次引证国共抗战成绩比较，并以这样的方式收尾：“（让我们套几句《中国之命运》来作本文的结束吧！）‘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共产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整个中国国家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

按照对方的逻辑，回答对方的问题，这是论战中时常采用的方式。

如前所述，蒋著所提出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是哪个党才能救中国，其次是中国的政治归宿。首先通过对前者的论证，再将后者纳入前者的政治轨道，因此，后者才是“中国之命运”最终归结。然而延安对蒋著的批判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将问题的范围基本限于前者，关于后者的论述十分简略。陈伯达在其文章中有关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只有一句话：“让以民众为主人翁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诞生出来吧！”范文澜在其驳蒋之文中多说了几句：“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陈、范所指，当然就是中国的另一种政治前途。但两文均点到而止，没有就此问题做进一步的展开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仅回答了蒋著所提问题的一半。

“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提出，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对“中华民国”的否定。由于这一点涉及抗战初期中共的四项承诺，延安所以不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显然是为保留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同样，延安对蒋著的批判仅由一批学者出面，而不是政治领袖，这种安排也是保留余地之意。

对于这个遗留问题，中共的回答放在两年之后。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毛泽东将其开幕词定名为《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本段及以上两段引文，见《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解放日报》1943年8月24日，第1版。该按语《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67页）有所记载，但未说明是否为毛所撰写。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解放日报》1943年8月25日，第1版。蒋著版本甚为庞杂，以上引文与本文前面引文，文字上略有出入。

《评“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第4版。

范文澜：《谁革命？革谁的命？》，《解放日报》1943年8月1日，第1版。

1937年9月发表的中共四项承诺，其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等等。见《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7页。

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

“两个中国之命运”，这是国共两个口号各自的政治逻辑的必然结论。至此，中共完成了对蒋著所提全部问题的回答。

结 语

国共两党原本就是依据不同的阶级基础、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而组建起来的严格意义的阶级政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把两党之间原本单一的阶级对立关系，变为民族与阶级、合作与对立双重关系的交叉。问题在于，无论形式还是性质，民族统一战线都是一种超阶级的政治组合。由于这一政治组合在国共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至少从现象上讲，必然形成民族意识对阶级意识的挤压。蒋著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批判阶级观点，主张“使中国的政治为全民政治，而不是阶级政治”。此言的实质，就是以否定阶级政治的名义，否定国民党之外其他的政治存在。

蒋著的出版真正引起毛泽东警觉的，正是它以民族模糊阶级的论点。7月30日，毛指示彭德怀：“望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报社论，及陈伯达、范文澜评《中国之命运》等文多印广发，借此作一次广大深入的有计划的阶级教育，彻底揭破国民党的欺骗影响，不要把此事的重要性看低了。国民党思想在我们党内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的。”所谓国民党思想，就是只讲民族不讲阶级，要求通过对蒋著的批判展开阶级教育，就是既要讲民族，又要讲阶级。

尔后，毛又告诫全党：“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蒋著与陈文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各自将两党的历史关系重新做了一次政治清算。这种政治清算的实质，正是两党的阶级关系警觉、坚定、明确的表现。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就口号而论，不仅响亮，而且具有一种特殊的鲜明性质。正因为它鲜明，一经推出，随即成为两党的两面旗帜。

“中国之命运”这道命题，提出了在中国应当选择一个什么党的问题。这是一种具有强烈的排斥性质的选择。这种排斥性质的选择提出于国共合作的框架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中国之命运，实际上就是国共合作之命运。蒋著的出版及其政治后果集中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它以著书立说的方式，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前途，完成了理论意义上的埋葬。

〔作者邓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徐思彦）

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中国之命运》，第124页。

毛泽东：《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和在敌后的八项政策》，1943年7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53页。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81页。

minister Yan Huiqing successfully guided public opinion. In so doing, he saved the Beijing government from the passive state it had fallen into as a result of the issue of direct negotiation, and made skilful use of public opinion as a support for official diplomacy. He was thus able to throw off Japan's strong demands for direct negotiation and to pass the issue to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for discussion.

The Nobodies Who Changed History: Debate over the Composition Questions in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n 1932

LUO Zhitian (71)

Changes to the form of Tsinghua University's 1932 entrance examination stirred up debate. Later discussions of these debates usually focused on the "couplet" part of the examination, although the debate within society at the time also involved the essay-writing question, which was equally hotly debated. In the course of this debate, "protests" from examine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were fully considered by the university authorities, and had direct effects on undergraduate admissions in that year, as well as on the composition questions in the next year's exam. In this regard, the protests may be said to have been highly effective. The university examination ceased to be merely a qualifying test to select successful candidates, but instead became a topic for public discussion that was itself subject to scrutiny. In other words, it became a public expression subject to review and judgment by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readers' letters in the newspapers and related debates also reveal an aspect of the ethos and thought of the times.

Chiang Kai-shek's Statements on "China's Destiny" and the Slogans of the Communist and the Nationalist Parties

DENG Ye (84)

In January 1943, China signed new equal treaties with Britain and America, in name at least ending its status as a semi-colony. Independence had been one of the major them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modern times; now, this goal had been achieved by the Nationalists. Seizing on the propaganda significance of the event, Chiang Kai-shek published *China's Destiny*. The central idea of the book was to replace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equality between China, Britain and America with the question of political choice between the Nationalists and the Communists. Two slogans emerged in China on the thesis of "China's destiny": one was "there would be no China without the Nationalist Party;" and the other, "there would be no China 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two slogans highlighted the class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mmunist and the Nationalist Parties even though th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ontinued.

The Return of the Chinese Changchun Railway and Its Impact on Sino-Soviet Relations

ZHANG Shengfa (99)

Negotiations on the return of the Changchun Railway to China traversed a difficult path.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1946-1949), as China's political situation changed rapidly,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ies of China and the All-Unio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 held tentative discussions over Soviet privileges in Northeast China, including the Chinese Changchun Railway. During Mao Zedong's visit to Moscow at the turn of 1949 and 1950,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signed agreements on a series of issues including the Changchun Railway.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the Soviet Union agreed to the return of the railway mainly because it badly needed China as an ally to deal with its own Cold War dilemmas. Stalin believed China could become such an ally. It was in particular China's performance in the Korean War that proved it was a reliable ally and finally resulted in the return of the railway. In the long run, this weakened the Soviet influence on China's economy as a whole, and diminished the influence of the Soviet railway management model on China's management of its railroad system. It also eliminated a source of friction in the two countries'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gradually eroded Soviet émigré society in Northeast China.

The Role Dilemma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Modern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Differences among Sub-cultures

CHEN Wenhai (122)

In the course of Western Europe's transformation from a medieval to a modern society, the Catholic church launched a movement aimed at "protecting the faith" to save itself. However, it